

编者的话：

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似乎越来越叫人看不懂了。

一场发生在日本的地震，竟引发了中国的抢盐风潮，从一线城市到县城乡村，超市里摆放盐的货架都在一夜之间变得空空荡荡。这件事如果发生在教育还未普及、信息渠道不发达的过去，尚且能够理解，但问题是，现在已经是21世纪的第11个年头了，中国的文盲率已经极低，报纸、电视和网络等传播媒介更是深入了社会的每一个毛孔，辟谣的声音那么大，抢盐的人为什么还是那么多？

实在难以解释，一些人干脆放弃思考，将结论归于国人的“愚蠢”。一家颇有名望的媒体，在头版头条打出了“食盐遭愚蠢抢购”的大标题。这样的态度令人心寒，作为一家媒体，在横加批判

之前，为什么不能多尝试理解和分析？“愚蠢”二字会遮蔽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不到抢盐风潮所折射的诸多社会问题。

永远不要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全部真理，永远不要被简单粗暴的结论遮蔽，因此，永远不要放弃进一步的思考。在本期1510周刊中，我们除了编选了网络上诸多对抢盐风潮解释的文字，还收入了两篇解读中东局势的文章，希望能够为您提供进一步思考的线索。

近段时间，香港政府向市民派钱一事沸沸扬扬，香港学者罗永生的分析精准明晰。他认为平均派钱不是良方，反是毒药，因为其“足以引起低下阶层之间的相互嫉妒。不过，最坏的还在于，这种‘一刀切’的利益再分配，偏离了一个自由主义社会底下，社会收入再分配应是根据一些可以供反思和理性辩论的公义原则。”

最后推荐一篇缅甸长颈人族群的故事。作者对常人猎奇的对象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引入了观看与被观看、国际政治与经济利益、文化传统与个人自由等许多可以延展开来的话题。

1510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摘选文章主要来自my1510.cn，同时我们也会选取其他网站和博客的好文和大家分享（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全部经过作者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 录



[在Google Buzz分享本期周刊]

【盐】

7-1 1510网友：中国“盐”症

“抢购商品总是与通胀预期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但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内里蕴含着民众对生活前景的忧虑和对政府信任度的降低，是社会动荡不安的先兆。”



“日本是大核民族，中国是盐慌子孙。”抢盐风潮之后，许多段子开始流传。这些段子没能解释的是：中国人的盐慌到底是为什么？在一五一十部落上，众多网友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们的思考或许都只是一家之言，但将这些一家之言集纳起来，亦能折射出抢盐风潮背后的中国“盐”症。

中国人之病

——道德血液不足症

凌寒：

通常情况下这种抢购风潮都是由部分不法商家在背后兴风作浪挑起，再有各地商家传谣起哄故意营造恐慌气氛，以期谋得暴利。此次也非例外，有消息称有不法商家借机炒作盐股，并提前购囤后引起全国大面积盐慌。

盐的粒儿：

奸商想趁机谋财，致使大量网络盐水军冲锋陷阵，忽悠大众。网络水军这两年的异军突起显然促成了一个新行业的悄然兴起和迅速发展。这些人跟韩国的Anti-fans应该差不多吧，但是，韩国的Anti-fans多半掺杂些个人喜好，只为了力挺偶像，打击对手，也属于性情中人吧。水军就不一样了，那是属于哪里有需要，水军部队就出现在哪里，雇主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完全没有原则。做的太过火，就容易引发法律问题。

——科学素养低下症

八菱创造：

客观而言，我们整体的自然科学知识水平都不是很高，这种土壤一次又一次的诞生了张悟本、翟鸿燊、陈安之这种江湖术士。这次浙江一位专家还在说要带上围巾护住脖子，真的是病急乱投医。大众因为自身的科学素养不够，加上这种恐慌性情绪，缺乏定心丸，自然就很盲目。一旦盲目就非常容易被利用。

据我那天亲眼所见，大部分抢盐的民众以中老年人居多，而且从穿着及谈吐来看，以底层民众为多。这部分群体他们本身信息渠道匮乏，当面临巨大的社会恐慌，尤其是核辐射这种人人谈之而色变但是谁都讲不清楚的东西，就会引起更大的恐慌。核辐射大家都知道是个非常恐怖的东西，但是具体危害到多大，会造成哪些危害，危害到什么程度，大家并不是特别清楚，所以出现了病急乱投医。

这次核辐射危机很多专家都搞不清如何防护，专家都搞不清，普通老百姓更加着急了。这时出现一个吃盐能够预防辐射，老百姓自然抱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去抢盐了。

——思维能力萎缩症

蓬间雀：

盐慌的背后，一方面是民众面对灾难或者灾害时候的近乎疯狂的不理智和无法理性分析事件以至于被人利用，易于煽动，人云亦云、闻风即是雨。岂不知即使是真理在传播的过程中也会变成一句谬论。

这与我们所受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九年义务教育虽然全国普及，但是教育背后的缺陷也日益显现。应试的所谓素质教育，致使我们成为只知道A、B、C、D的选择机器，打勾划叉的点头摇头动物。段落大意，重要意义成为一个个的束缚而并没有引起学生对于知识的渴求和对于知识的兴趣。

ABCD致使学生养成了填鸭式思维。单一，更谈不上什么所谓独立思考。依靠考试的一格格成绩分数来证明一个学生的学校成绩优劣，早已根植于国人的脑子里。几个家长聊天，无非就是自己的儿子又考了满分，谁家的女儿却门门不及格。那些书本上的“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看待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只是在答卷中的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已。学生只知道背诵记住诸如重要意义人物事迹等等便可以换来一个大大的奖励和笑脸，而特立独行，独立思考，则会成为众矢之的。

而对于所谓的抵触言论确往往是深信不疑。外国媒体的歪曲报道就会成为一个游行“呐喊”的风向标、指示灯、指南针。容易受到来自无德大小媒体的煽动，却不会更加理性的思考一下事件和报道的真实可信度有几何？一个手机虚假短信，即可把身家性命维系与此，不得不让人反思。

盐慌就是不法商贩的谎盐，不法商贩利用日本地震此机会，暗中宣传。充分利用网络和手机短信来大放厥词。不法商贩向钱看齐，唯钱是命，毫无道德底线可言。经济的高速发展，GDP虽然是位居世界第二，国民的思想并没有为之跟上时代的潮流。

——既往病史的心理阴影

凌寒：

中国老百姓是敏感的，特别是在物资短缺方面，源于计划经济时期粮食及其他各种物品短缺造成的心理烙印还没有完全抚平，如此一旦有一点风吹草动即会一拥而上。非典时期的抢板蓝根、囤萝卜等，及至今日的抢盐风潮，如此的恐缺心理在短时间内仍无法完全消失。

中国之病

——信息渠道闭塞症

韩青：

有一个著名的谣言公式：谣言的能量=谣言对于受众的重要性×谣言证据的含糊性/公众对谣言的批判能力。权威部门要及时发布公众关心的准确信息，比如除了核安全局发布各城市核辐射值外，海洋和气象部门也要对海洋环境的各项指标及时公布。另外，不能只给出“光杆论断”，还要有翔实的论据和形象的解释作支撑，这样才能有效消解公众的担心。

八菱创造：

尤其是那些老头老太，又不会上网看新闻，更不会用微博，对他们而言，最主要的信息渠道是身边的同龄人。一看身边同龄人去抢盐，他就不由自主的不抢。因为缺乏信息渠道，他们就会容易被忽悠。所以想辟谣，必须增加他们身边的信息渠道。

三叶徐：

信息封锁导致信息交流太狭窄，民众不容易得到更广更真实的信息，同时也妨害了民众辨别能力的提高。信息封锁在本质上是一种愚民手段。虽然信息放开会如江河水流会有些泥沙，但是和倒脏水不能把孩子一起泼掉的道理一样，不能因为有不够真实不够健康的信息就实行严格的信息封锁。更何况，所谓的真实和健康的标准由某一小撮缺乏监督从不露面不留姓名的“人”来制定，谁都知道不靠谱，但还就是坚持了这么多年。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开放流畅的空间虽然有细菌但不会有损于机体，只会增强其免疫力，促使机体更健康。更何况在多元化潮流已成时代标志的当代，企图通过信息封锁维持所谓的“稳定”，无异于明清海禁，闭关锁国带来的溃败危害历史早已无数次展示，科技进步也一定会加快这个进程。

信息封锁带来封闭、孤独、空虚、不安、恐惧，而这是最容易导致人非生理的社会性疯狂的几种状态。人的天性渴望互爱和交流，如果把人长期置于封闭、孤独、空虚、不安或者恐惧的空间，那么他/她基本上会疯狂，除非这个人是圣贤或有缺陷。当然，如果严格分析，圣贤是先前积累了许多知识和智慧之后，才能在上述空间中保持思想独立不受或少受侵害，而真正的信息封锁是要从开端进行的，所以圣贤不会产生。因此，信息封锁的极端是所有人都成为疯子和傻子。根治的方法就是拆除藩篱，让信息自由流通，让民众自由的互爱交流。让民众有他们互助沟通的圈子和团体，让民众自由结社参与社会事件，让民众的情感自由流露出去，那么，他们就不会疯狂了。否则，也不需要疯人院了，整个国家就是一家疯人院。众人皆疯而我独醒的人最痛苦，最后也只能疯掉了，就像《飞越疯人院》里的故事。

——政府公信力缺失症

凌寒：

在这次的抢盐风潮中还有一个不得不注意的现象是，任政府和专家如何辟谣，百姓置之不理，甚或因此让百姓更加恐慌。如此让我们再次看到了政府公信力在下降触底，百姓多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但还有很多百姓说“别听他们在那说好听的，说不定人家都已经囤了好多了的，就让我们老百姓不买，都给他们留着”。长久以来的官民矛盾，在暴力拆迁，暴力维稳、不公行政等拭不去的阴影下，官民互信的基石早已被抽空并轧的粉碎。而一直以来以官员身份出现在媒体前的所谓专家，也被认为是政府院里的“家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在百姓心中也毫无威信可言。

对于政府，我们的民众成为了完完全全的怀疑主义者。政府越是苦口婆心的让不做什么，百姓越是抢着做什么。政府说控制房价，不要买房，没有人相信，房价再高，做房奴再苦也还买；专家辟谣说群蛇迁徙不是地震预兆，百姓开始在房外置床；政府专家说是“谣言”，百姓抢盐更疯。

如此的局面，实让政府部门值得深思，在官民互信机制不作用的情况下，重塑政府威信是长久之计，也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专家建议支招的很多。而在此，笔者只想说，既然政府各级部门都在赶微博热开官方微博关注民心舆情，那就不能只是赶个时髦，应该做好舆情监测并及时作出正确判断，为相关部门及时提供参考信息和决策依据。而不应该是只关注德艺双馨的日本艺人，发发官话、通稿，搞搞宣传。以至于被不法分子钻空，造成民众恐慌，政府受压，还不如提高舆情分析应对能力，以未雨绸缪。

super八戒：

抢盐风潮，与政府、主流媒体公信力下降脱不了干系。民众抢盐，不仅由于无知，更出于一种无视，抢购囤盐出现之初，各级政府和媒体不断澄清：“日本核辐射污染影响极为有限，我国食盐90%为井矿盐，储量够吃5年”，行动不可不谓迅速，但民众无视这些铺天盖地的信息；相关领域专家一再辟谣“食用碘盐可防核辐射”等虚假消息，抢购风潮仍然迅速升级蔓延，在中国，缺乏职业伦理的“专家”早已经沦为“砖家”，毫无权威可言。

老百姓见多了，那些惊天骗局、荒唐奇异的官方解释，那些骗人的把戏、冠冕堂皇的说辞，躲猫猫会死，喝开水会死，正常人会被精神病，堂堂省级卫视也播放虚假广告……自然而然，老百姓选择无视公共渠道的声明、保证和解释，他们更愿意捕风捉影，相信打听来的小道消息和个人的经验判断，之前震动全国的“钱云会案”是典型案例。对比日本，地震之后，当地民众并无大的恐慌出现，不仅因为日本建立了严密的灾害防护体制，更得益于信息公开和民众对媒体政府的信任。

公共机关公信力的丧失，是中国人人所共见的事实，这并不让人乐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重建公信力、化解民众与公共机关间不信任的坚冰，也需要时日。正如《什么是公信力》一书

的作者道格拉斯·费韦尔所说："我不知道公信力是什么，但失去了它就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我们花了许多年才把那些信任找回来。我们曾经亵渎了公众对我们的信任。"

——社会情绪焦虑症

关不羽：

虽然我们也有些核电，可是保持高度神秘，与公众视线中距离遥远。而辐射危害看不见、摸不着、会潜伏、能渗透，赛过余则成，胜似服部半藏。这种无影无形的威胁，最容易刺激人的神经。日本事发之后，由核泄漏扯出碘片，再从碘片到碘盐，这是一条线索。再有，核泄漏联系到海水污染，海水污染衍生出盐污染的想象。两条线索，都指向了盐，在危机心理的压力下释放，形成了普普通通的盐就被想象成"攻守兼备"利器。风潮一起，即使不相信盐能防辐射的主妇们又开始担心盐断供的担心，遂成愈演愈烈的趋势。看似荒唐的光景，原理不过如此。

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是，社会公信力的垮塌。社会公信力建立在权威可信的信息发布，最主要的是政府、媒体、专家三家。三家博弈，把公众训练得很"狡猾"，深谙货比三家之道。谁也不尽信，但是也不尽疑。高音喇叭喊话的，不管是哪家也得掂量分量，吹吹小牛还可以，信用破产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如此，公信力便有了基本点保障。而在中国国情下，基本是三位一体的格局。媒体统稿体发布、专家背书体发言，皆为官方信息的注脚。一主二仆，高度一致，姿态确实优美，但也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副作用。楼倒桥塌，专家出来保驾护航；群体事件，媒体出来宣传教育。最重要的是，新时代最最最可爱人——国统局、发改委不断给我们带来各种喜讯。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是公众"眼见为虚"，权威信息才是"耳听为实"。公信力不断被浇水，温度顺利冷却。到了"狼真的来了"，还能发电发光吗？安全封堆了。于是，盐，闪亮登场！

我是公民：

在这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今天，没有太多安全感的民众对公共机构们的调控协调能力显得不太信任。所以当听说食盐没有时，民众就如遭遇世界末日，或如皇帝被拉下马，顿时全民上下慌了神，乱了主，或紧张或兴奋，四处乱窜买盐巴……

涂子方：

此次民众疯狂抢购食盐，表面上是由偶发事件引起的，但实际上与社会大环境有紧密的联系，是国人心理的曲折反映。

事情决不是老百姓被误导"吃碘盐可以抗核辐射"那么简单，没有多少人会相信这种鬼话。虽然不相信，大家还是去抢购，这其中一定是另有原因。

66我老人家这一辈子，曾见证过几次食盐抢购风。

那还是在内地生活的时候，也闹通货膨胀，邻居用板车拖了一麻袋食盐回来了，可怜的邻居，他那次买的盐，估计他全家这辈子都吃不完。而就在那一年，北京发生了一场至今仍"不堪回首"的"政治风波"。

抢购商品总是与通胀预期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但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内里蕴含着民众对生活前景的忧虑和对政府信任度的降低，是社会动荡不安的先兆。

super八戒：

中国爆发的抢购囤盐风潮，其背后弥漫着一种末世情调，透露出现代人整体的生存焦虑。近十几年，全球气候变得极端难测，世界范围内的灾难频繁，金融海啸等社会变革更加剧了动荡感。于是，“2012末世论”广为流传，智利地震、冰岛火山喷发等事件被调侃为“地球已经调成振动模式”，在普遍的紧张焦虑生存状态下，民众变得敏感，易于出现群体性恐慌。

中国人的生存状况恐怕更为糟糕，2008年以来，陆续经历了举国同悲的汶川地震，还有严重地干旱、洪水、雪灾、泥石流，自然灾害不胜枚举，给国人以巨大的物质损失和心灵创伤，使人人如惊弓之鸟，稍有风吹草动便生出大的风潮：2010年2月，山西地震应急演练被误解为将有地震的传言，大量居民聚集在广场街头；2010年7月，群众谣传8月13福建泉州有大地震，引起大批人员撤离……

不仅如此，急剧工业化现代转型冲击着中国人，每个人都被裹挟其中。食品安全、能源危机、通货膨胀、工业污染使大多数中国人处于焦躁、不安、抑郁的亚健康状态。事实上，民众的焦虑并非庸人自扰，三鹿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等诸多食品安全事件令国人吃每一口东西都提心吊胆，南京天然气管道爆炸、大连炼油厂大火、福建南平紫金矿业尾矿污染等工业化工事故让人心惊肉跳，今年2月份，江苏响水“化工厂爆炸传言”竟造成莫大恐慌，使大批民众连夜撤离。

【势】

7-2 陈行之：中东正在经历一种碎裂

“具有自觉意识的政治思想永远是非正义国家制度的致命威胁，所以，在这个阶段国家往往将政治和文化精英分子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这种现象几乎在任何形式的文明板块（包括西方文明）中都曾经出现，在现当代，极权专制主义国家大规模的文化围剿和政治镇压也往往发生在这个时候。然而镇压可以消灭人的肉体，却无法撼动由人性生发出来的思想；镇压带来的恐惧可以让社会暂时沉寂，却无法改变人性作出最终的选择。”



1

如果用“巨变”或“革命”概括中东目前正在发生的事件为时尚早的话，那么，“碎裂”这个词或许更为准确。“碎裂”的意思是：一种精心维护的价值观在人类本性要求和世界文明进展中出现了裂隙，某些部位产生了脱落，乃至于造成一个社会或文明体的结构出现松散和破碎。

相对于人类共同体，伊斯兰世界长久以来是一个例外，尤其在近当代激烈的现代化进程中，伊斯兰文明特别倚仗于伊斯兰教，把它作为认同、意义、稳定、合法性、发展、权力和希望的本源，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伊斯兰教是解决方法”的“伊斯兰复兴运动”。

“伊斯兰复兴运动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是伊斯兰文明向西方作调整的最新阶段，它是在伊斯兰教而不是西方的意识形态中寻求‘解决方法’的努力，它体现了对现代性的接受，对西方文化的摒弃，以及重新把伊斯兰教作为现代世界中生活的指导来信奉。”（[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亨廷顿的这种归纳，使我们五味杂陈地联想到包裹着我们的儒教文明，尤其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应当引起的别的关注，而关注我们自身的最好方式，是到彼方寻找此方的某些特点或者说规律，这样，我们的话题就要扯远一些了。

2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时，叙利亚学者密歇尔·阿弗拉克和萨拉赫丁·比塔尔出版了一本名为《阿拉伯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态度》（1944年）的书，第一次提出了“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概念，阿拉伯社会主义成为当代世界颇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派别之一。阿拉伯世界21个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中，已有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苏丹和利比亚等7个国家先后宣布信奉并实行阿拉伯社会主义。

阿拉伯社会主义运动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如纳赛尔主义、卡扎菲的第三世界理论、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的自治社会主义和突尼斯的宪政社会主义等等。

阿拉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运动，追求哪些政治目标呢？简括说来有以下三点：一、继承起源于伊斯兰和阿拉伯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争取实现阿拉伯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二、将阿拉伯世界劳动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与阿拉伯民族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联系在一起；三、建立公正合理的经济制度，清除阶级剥削以及由此产生的贫穷和愚昧。

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 (1918—1970)是阿拉伯世界标志性人物，他创建的“自由军官组织”于1952年发动“七·二三”革命，推翻了亲西方的法鲁克王朝，宣布成立新的社会主义政权，纳赛尔出任埃及总统，开创了埃及的“纳赛尔时代”。纳赛尔继承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理论，吸收了国际上的社会主义思潮，发展成为主要表现为泛阿拉伯理念的纳赛尔主义，即主张瓦解殖民边界，成立一个阿拉伯超国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世界上曾经有过一个叫“阿联”的国家了）。这种主张在随后的历史岁月中成为中东地区很多思想家和活动家秉持的价值理念，也可以说是相当一些阿拉伯国家共同默认的意识形态。纳赛尔在《革命的哲学》一书中就曾经把阿拉伯、非洲大陆和伊斯兰世界称为“三个圈子”，强调埃及必须紧密与之联系在一起。“我们的活动不能不围绕着这些圈子进行，不能不竭尽全力在这些圈子里有所作为。”

结果，这个“圈子”发生了很多耐人寻味的事情。

我们看一看伊拉克。

伊拉克复兴党建立政权以后，开始建设具有伊拉克特色的“阿拉伯社会主义”，1975年11月，萨达姆在党的宣传工作讨论会上发表题为《论一个阿拉伯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谈话；1977年4月，他又在中央计划会议上作了题为《我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的发言，提出了关于“伊拉克建设社会主义特殊道路”的思想。

如果进入我们的语境，或许可以用“萨达姆重要思想”来概括他的主张，这些主张具体体现为：一、“社会主义建设”既有理论上的特殊性，又有实践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阿拉伯民族和伊拉克国家的特殊条件所决定的，党的“特殊的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开放性”，以“适应现实的变化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思潮”，然而这种“开放性”决不意味着“照抄照搬”或“对阿拉伯范围以外的思想

效忠”；二、复兴党既是“工人阶级政党”，又是“全体群众的党”，党“信仰伊斯兰精神和宗教原则”，“不在无神论与宗教信仰之间保持中立”，但它“不是宗教党”，伊拉克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只能由复兴党一党领导，任何其他政党都不能担负这一责任；三、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依靠力量是“基本劳动者和革命的社会阶层”，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必定要“同资产阶级或它的某些阶层发生冲突”，而且要“经过激烈斗争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残余”；四、伊拉克复兴党在伊拉克的目标是建设一个“阿拉伯民族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除了具有一般的社会主义及民族特性外，还具有“人道主义的特点”，即承认个性，允许私有财产和私有制并存，在公有制企业中实行国家集中指导下的“群众民主管理”，以“防止蜕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

上述“萨达姆重要思想”经由国家控制的舆论机器大肆宣传，被弄得很神圣很庄严，但是就其实质来说，显然具有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概括的那种被称之为“历史主义目标”的东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结局已经表明，历史主义深处绝不是一片光明，那里必定潜藏着最黑暗的极权专制主义。

阿拉伯国家的极权专制主义戴着各种各样的面具，其内在的社会伦理特征却极为清晰地表露出了其非民主的品性——
亨廷顿认为，“穆斯林国家的政府绝大多数是非民主的：君主政体、一党制、军事政权、个人独裁或上述几种情况的综合，通常建立在一个有限的家族、部族或部落的基础之上，在一些情况下严重依赖于外国的支持。摩洛哥和沙特阿拉伯的政权试图援引某种形式的伊斯兰合法性，然而这些政府大多数缺少根据伊斯兰的、民主的或民族主义的价值观来为其统治辩护的任何基础。……它们是‘地堡式的政权’，是压制性的、腐败的、脱离其社会的需要和渴望的政权。”

亨廷顿断言：“这样的政权可能会维持长久，它们不一定会垮台，然而在现代世界，它们改变或垮台的可能性很大。”（上述引文均出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

结果可能性成为了现实，摩洛哥的政权垮台了，埃及的政权垮台了，利比亚的政权正在垮台之中，巴林正在经历风雨飘摇之夜……其他政权是不是要垮台，会不会发生上世纪80年代在东欧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做预测，但是，依据亨廷顿的观察，大致上可以认为它们同样处境危险，表面上的“稳定”随时都可能丧失，看样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维护稳定都将成为阿拉伯国家政府的当务之急，至于稳定能不能在不改变社会政治结构的情况下被维护住，只有老天爷或者鬼才知道了。

3

一个社会或文明体，就像宇宙星体通过万有引力保持某种形态一样，是通过一定的价值系统维系其存在的基础并显现其基本特征的，支撑西方世界兴起并被大多数人类接受的，就是被我们称之为“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理念。这种价值系统出了问题，即使是西方文明以及大多数持有这种信念的人类群体，也将无法避免地碎裂、瓦解和崩溃。

21世纪之初中东动荡在我们眼前展开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伊斯兰世界由国家维护的价值系统，无论纳赛尔主义、卡扎菲第三世界理论、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的自治社会主义还是突尼斯的宪政社会主义经历的一种碎裂——我们暂时不说瓦解和崩溃。

好端端的东西，怎么突然就碎裂了呢？我们从“里面”和“外面”说。“里面”指人性，“外面”指世界。

人性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对自由的妨碍。人性的这种本质，体现在任何形式的文明板块，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美洲文明，概莫能外。如果国家、政党或团体妨碍了人的宝贵自由，人性就将选择摒弃国家、政党和团体，放弃曾经的忠诚。人类虽然很软弱，但是世界上却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止人类用心灵作出的这种选择；如果一个社会或文明体本质上是压抑人性的，人性也必将进行反抗，这种反抗最初表现为政治淡漠、丧失对国家事务的兴趣乃至于某种程度的道德滑落，社会失去向心力……这就为与社会基本价值观相抵牾的非国家意识形态的民间思想创造了温床，在这个基础上一定会形成（主要是通过政治和文化精英分子）较为系统的政治思想。

具有自觉意识的政治思想永远是非正义国家制度的致命威胁，所以，在这个阶段国家往往将政治和文化精英分子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这种现象几乎在任何形式的文明板块（包括西方文明）中都曾经出现，在现当代，极权专制主义国家大规模的文化围剿和政治镇压也往往发生在这个时候。然而镇压可以消灭人的肉体，却无法撼动由人性生发出来的思想；镇压带来的恐惧可以让社会暂时沉寂，却无法改变人性作出最终的选择。当深知自己被国家的乌托邦幻想欺骗的民众再也无法忍受下去的时候，这个由专制主义制造出来的和谐世界也就命中注定无法再维持哪怕是表面上的安宁了，人性将义无反顾，将生死置之度外，在爆炸性的革命浪潮中去寻求自由、民主和尊严。

这是阿拉伯世界目前发生动荡的根本原因之一。

以利比亚为例。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2011年2月25日发表该刊专栏作家詹姆斯·特劳布的文章：《阿拉伯梦想的终结》，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受埃及“自由军官”发起造反并获得成功（1952年）的启发和鼓舞，卡扎菲于1969年发动政变，推翻了伊德里斯国王。1967年，由于在与以色列的战争中遭受惨败，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声誉受到很大影响，夺取利比亚国家权力的卡扎菲不失时机地宣称：“告诉纳赛尔总统，我们是为他反动这场革命的，他可以拿走我们的一切并添加到阿拉伯世界的其他资源中去，一起用于（反对以色列、争取阿拉伯统一的）战斗。”

“随后几年，卡扎菲与包括乍得、埃及和苏丹——它们的人口都比利比亚要多——在内的邻国签订条约，徒劳、简直荒唐地追求纳赛尔的泛阿拉伯国家的梦想。”1975年，卡扎菲

在首次出版的“绿皮书”中设想了这样一个国家：它直接由自己的公民统治，没有通常的居中机构——政党、议会乃至于中央政府。革命还将废除非国家所有的组织和团体。“这本‘绿皮书’是对乌托邦式极权主义的一次演练。”（引文均出自《阿拉伯梦想的终结》一文）卡扎菲的这种许愿式的思想在一段时间里成为了阿拉伯世界的安慰剂，它分散了民众的注意力，使之完全忽视了社会公正究竟应当来自何方，掩盖了统治者对国家责任的丧失和亵渎。独裁在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遮掩下披上了合法性外衣，变得骄横而不可一世，它忽略了潜藏在每一个人的人性对世界的打量和审视，这就是说，有一种力量始终在蓄积。如果社会或文明体为这种力量预留了宣泄的通道，社会通过某种形式为释放这种动能提供必要的条件，它就不会以爆炸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如果反过来，它也就只能在某个时间点像火山爆发一样显示自己的存在了。

结果，利比亚的火山爆发了。

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标志，利比亚由于庞大的石油资源出口相对比较富裕，人民受教育的程度较高，这不仅为独裁者之非法提供了遮掩，同时也为人性的觉醒创造了条件，当也正因为这样，由人性觉醒造成的社会推力才无比强大，这个国家的革命浪潮也格外令人震惊。

4

“外面”又是一种什么情景呢？

尽管亨廷顿认为世界上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文明，并且预言未来世界将在这些不同的文明体之间爆发越来越严重的冲突，但是，他也强调了在所有形式的文明之中，人类群体在很多方面是具有大致相通的善恶标准的：“在所有的社会里，人类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价值，如把谋杀看作是罪恶；也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体制，如某种形式的家庭。大多数社会的大多数人民具有类似的‘道德感’，即‘浅层’的关于什么是正确和谬误的基本概念和最低限度道德。”（引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意味着人类能够信奉和遵守某种大致相同的价值标准，这种标准，目前被我们粗略地称之为“普世价值”。

为什么要用“粗略”这个词呢？这是因为人们在谈论“普世价值”的时候，往往过于强调它的西方成分或者说西方特性，甚至可以说，把“普世价值”作为了“西方价值”本身，即便是亨廷顿也过度使用了这个概念——在《世界秩序与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他在谈论普世价值的时候罗列了诸如西方社会继承西方古典文明、西方文明的基督教和新教来源、西方文明的欧洲语言、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法制、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以及个人主义等等特征，无形中强化了带有强烈西方色彩的普世价值与人类共同价值的边界，从而导致他对世界未来的观察过度忧虑和悲观。

实际上，我们不应当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自由和民主不独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更是普遍人性的内在要求，是历史发展不可替代的原始动力，即使没有西方价值之说，非西方文

明也会把它作为最崇高的目标去追求，就像人天生具有追求温饱和心灵满足的本能一样——即使被封闭在密不通风的“国家”实体之内的“屁民”也知道，不被国家欺凌是好事情，用选票决定谁来施行统治是好事情，自己的利益能够体现在国家意志中是好事情，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私有产权是好事情，房屋不被勾结在一起的权力和资本强拆是好事情，恶棍一样的官员不敢来强奸自己的女儿是好事情。

对普通人来说，普世不普世其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要活得有尊严，只要不被欺负，就不在乎什么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或儒教文明……我想，在阿拉伯国家社会底层讨生存的小民也一定是这样想的，北朝鲜那些由于罪恶的专制统治而濒临死亡的人民也一定是这样想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普世价值就是人类的普遍价值，任何与之敌对的力量，都是人类最凶险的敌人；我们甚至还可以说，人类史就是反抗专制、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历史，不同点仅仅在于，西方走到了全人类前面。

再说一遍：以自由民主为标识的普世价值逐渐成为全体人类的理想不是偶然的，它即渊源于我前面说到的人性，亦含蕴在由人类理性推动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20世纪最值得记忆的事件，莫过于人类在文化上逐步走向趋同，全世界各民族在价值和信仰方面作出了大致相同的选择，人类社会出现了基本趋同的方向和基本一致的实践体制。单是上世纪70和80年代，就有三十多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发生重大演变——处在专制独裁统治下的的人民发一声喊造起反来，改变了国家的颜色，信奉号称能够改变人类发展方向和结局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破产，苏联帝国垮塌，东欧国家发生巨变，以社会主义作为标榜的国家政治制度，从反人民的专制独裁体制转变为人民是社会唯一主人的自由民主体制。

虽然不能认为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和自由民主制在全世界取得了普遍胜利，就像美国学者福山那样，但是这件事至少证实了人类在为自己的未来作出选择时，遵循了大致相同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原则，心灵的逻辑契合了政治的逻辑。尽管世界上经常有一些特立独行的国家宣称“绝不”，但是，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作为人类内在本性的选择，由这种选择汇集而成的历史大潮，将无人能够阻挡。

这也是阿拉伯世界目前发生动荡的另一个根本原因。

5

我们还应当具体说一说中东。

我在《政治成熟：国家变局的决定性条件》中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我的上述见解，我举例说，穆巴拉克长达32年的统治，在某些方面顺应了历史潮流，较好地处理了国内和国际问题，为埃及创造了难得的发展条件，政治相对稳定。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埃及的经济得以平稳发展，

人民在一定程度上也享受了这种成果。在这种情况下，埃及人民本应当对统治者感恩戴德才是，为什么32年以后反倒发生了让人始料不及的“革命”了呢？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历史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迎来了埃及社会的政治成熟，以往人们未曾意识到或者说即使意识到也未曾反抗的东西，瞬间失去了全部合法性，埃及人民突然发现，一个国家被一个人统治32年是极为荒谬的，他们提出了很多以往绝不敢提出的政治诉求，这种诉求是那么强烈，以至于即使穆巴拉克肯作出让步，抗议者也坚决拒绝任何对话，“我们只是要穆巴拉克下台！”

穆巴拉克也许很不明白，人民为什么要抛弃他？他也许很委屈，内心里甚至纠结着某种怨恨，但是，只要他理性地审视一下历史，就会明白，有一些事情，该发生一定会发生，没有人可以阻止，就像没有人可以阻止成熟了的果子从枝头掉落一样。至于卡扎菲之类从最开始就以非理性目光打量世界，以非理性手段对抗世界和自己的人民的独裁者，是绝不可能具备这种理性的，所以他也就绝不可能对最近发生的事情做出合乎理性的解读。他欺骗自己说，他遭遇的事情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基地组织从两方面夹击的结果，他也许至死都不明白，他不过是难以抗拒的历史大潮中的一个碎片，这种大潮的产生，恰恰源于利比亚和整个中东社会的政治成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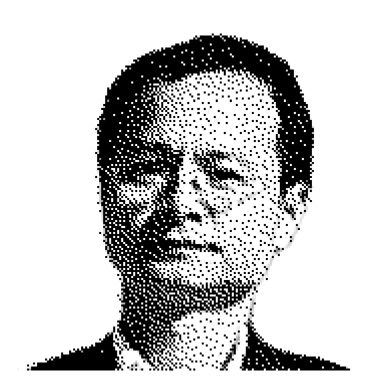
这里所说的政治成熟，指的就是普遍人性的深刻觉醒，表现在社会层面，则是我前面说过的：一种被国家力量精心维护的价值观在人类本性要求和世界文明进展中出现了裂隙，某些部位产生了脱落，乃至于造成一个社会或文明体的结构出现松散和破碎。

中东目前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过程。至于过程之后会不会产生上世纪80年代苏联溃解和东欧巨变的那种历史后果，现在断言也许还为时尚早，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一件东西一旦出现碎裂，要想把它恢复到原来的形态，是极为困难的，这预示着不管怎样历史都将往前走，统治者必须让步，其结果将是人的进一步觉醒——结局仍旧不可避免。

这就是人性的力量，这就是历史的力量。

（陈行之，作家，学者。原文地址：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qqgc/article_2011031931922.html）

7-3 斯伟江：利比亚的难局：主权v人权？



“人权和主权孰高孰低，是否要武力干涉，不是科学二字能尺量的，虽有一定规律，但也只能如律师办案，医生看病一样，个案判断，症状相似的，病因未必一样，治法也大不一样。”

联合国安理会作出1973号决议，按照联合国网站的官方译文如下：

“决议对卡扎菲政权没有遵守2月26日通过的第1970号决议深表遗憾，要求立即停火，停止对平民的袭击；决议授权会员国在通知秘书长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利比亚平民以及包括班加西在内的受到卡扎菲政权袭击威胁的平民居住地区，但这些措施不包括对利比亚的任何形式的外国占领”；（见联合国中文网站）。联合国1973号决议，实质上授权成员国可以干除了外国占领之外的一切行动。

对此，中国、俄国、德国等投了弃权票。实际上是对此表示中立。而美、英、法是积极推动者。中国、俄国本来是反对人权高于主权的，在前南问题上就如此表示，本次弃权是一种妥协。德国的态度比较令人奇怪，但是，德国人二战后是以商立国，典型的商人国家，商人重利轻是非，德国人的行为，也可以理解。你可以看出，德国是欧洲国家最现实的国家，在中国行贿国企也是急先锋，上帝对其奖励是，他现在是欧洲经济最好的国家。

本文想浅谈主权、政权和人权的难局。理论上，主权和人权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冲突的。建立国家本身的目的就是建造一个可以挡风遮雨的地方，国家中大部分人自愿待在这个主权国家的边界内，按照多数人的意志生活。所谓，民有、民享、民治的国家，当然要保障人权。

主权一词就其中古世纪拉丁字源，意指高高在上。原本指神学中的上帝，移用为疆域之内的最高统治者的权力（蔡英文《主权国家与市民社会》）。中文用主权时，往往是指对外自主行使一国最高权力。所谓独立主权。对内，往往称政权。两者其实同一。是否干涉主权独立，要看这个（主权）政权代表谁？代表人民，违背政权者意志的外人干涉政权是侵略，如政权代表独裁者、占领者？外人干涉就很复杂了！第一次海湾战争谁说不是正义的呢？

一些国家，如利比亚，有主权（政权），没问题，但，政权是否在民？还是在卡扎菲家族手中。当然，卡扎菲自己会宣称自己代表人民，问题是，代表人民都需要有一个形式和实质，一般公认的制度是票选民主，不清楚老卡是否搞一个形式票选，但是，即使有个票选形式，如埃及

，最后，民众通过街头革命的方式，表明，所谓的票选是假的，并没有实质公平、自由的选举，这时，政权仍不在民！如果政权不在民众，而独裁政权实际上只代表自己，因此，当其搞种族屠杀、或者大规模屠杀平民时，人权和主权仍没冲突。因为主权在民，而民众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愿意无辜屠杀自己同胞。是政权在屠杀。当然，内战，纳粹时，会存在冲突。

按照洛克的理论，国家实际上是公民结社而保护自己的产物，如果这样的话，人权高于主权就理论上没问题，问题又在，人权可以分为很多人的人权，而主权只有一个。假如一个国家，如卡扎菲政权，其家族亲贵等有人权，甚至超人权，而一部分人没人权，如何来判断人权和主权的高下？甚至一个国家，少数人人权被剥夺，多数人人过得还可以，如何判断人权、主权谁高谁低？假如后者都可以干预，几乎美国人可以干涉很多非民主国家的内政了！非民主法治国家，侵犯人权，比比皆是，按照我国的《美国人权问题白皮书》，美国人权问题也严重，中国，不妨以姑苏慕容的方式，解救其平民，如果实力和朋友足够多的话。外交战线，实力为王。因此，实践上，所谓人权高于主权，没有多少意义！

洛克的理论是一种假设，其实，大多数国家历史上是被征服的，征服之后建立政权，民众慢慢习惯并接受、默认，拥护。如满清政权，汉族从反抗，到接受，到后来拥护，即使曾国藩也死心塌地，其合法性一直要到晚清民族观念重新兴起，才会有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加上满清权贵的颟顸、刚愎自用，朝廷覆灭，国家仍在。政权形式上改为民国，然后，是否仍政权在民？关键仍是判断标准，民国前期票选制度，只能衡量公意。抗战时，无疑公意在重庆政府，之后，征服抑或解放，两岸都可以各表！英国人被诺曼底公爵征服时，也是如此。

回到关键问题，谁来判断政权在民还是在独裁者手中？现代社会，在没有实质票选民主的情况下，一般可以推定政权不在民。个别情况下，也有例外。此时，理论上可以用公意来判断，把公意定位大部分人的意见。但一样，公意很难具体衡量，个案中，埃及的军队没有动手，至少实质上，他们了解大多数民众的意愿。而利比亚，由于其社会发育不如埃及，加上卡扎菲仍使用外国雇佣军等抵死顽抗，公意到底如何，外人只能根据情况自己判断，至少，有一部分利比亚国民在反抗，国内混沌一片，联合国大多数旁观者国家做出决议，可以解读认为，利比亚政权不代表多数人民，根据决议原文，称之为，卡扎菲政权，并未使用利比亚国家政权，而决议旨意在保护平民，也避免了对政权属谁的清晰判断（内政）！

但是，即便是独裁政权，如果不存在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国际社会也不会愿意武力干涉其内政，毕竟侵权人权的情况，在每个国家都有。都要拯救，如随手拍，解救大龄女青年一般，实属于mission impossible！所以，人权、主权（政权）只有在极端条件下，才会有冲突！一旦外力干涉，甚至入主占领（如伊拉克），主权不在人民，失去正当性，外国占领军容易成为另一个正当起义的目标。这中间绝对不是人权高于主权口号说能解困的。

人权和主权孰高孰低，是否要武力干涉，不是科学二字能尺量的，虽有一定规律，但也只能如律师办案，医生看病一样，个案判断，症状相似的，病因未必一样，治法也大不一样。这次病人卡扎菲，经大多数医生诊治，认为需要吃药打针送医院，部分名医不动嘴围观，结局，估计也是要进医院的。哪怕老卡自己认为没病，这和我国精神卫生防治法规所规定，自己认为没精神病的，是属于精神病症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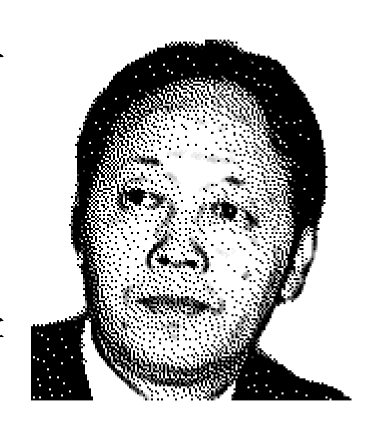
老卡准备参加集体红歌比赛吧！

（斯伟江，知识产权律师。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9cb36b0100roqv.html）

【法】

7-4 陈有西：法律应当是所有人的挡箭牌

“如果这样把法律道具化，显然，当事人眼里的法律已无任何神圣性可言，当然也就谈不上对法律的任何敬畏，而只有纯粹出于控制需要的功利地利用法律。”



“文革”中法治荡然无存，令整个国家陷入内乱，冤狱遍地，甚至堂堂宪法连共和国主席都保护不了。很大程度上是吸取这一惨痛教训，通过多年立法努力，中国法律条文大致完备，无法可依的问题基本解决。惟此，今年“两会”中，吴邦国委员长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建成。如何从有法可依，向有法必依转型，即如何从法制向法治转型，则是新时期朝野达成共识的攻坚目标。因此可以说，中国法治建设，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这一阶段的重点，已经是以法律规范公权力。以法治国，重在以法治官，以法治权。在这特定的历史阶段，法治思想的交锋也变得复杂起来，也有一些不和谐音符。在今年“两会”中，个别官员公开宣称：“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跟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庄严宣告，形成强烈对比，令人侧目，也令人深感向法治转型的艰难。

“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也许只是一时的发言失误，但是表现出来的官员潜意识，是令人担忧的。这种说法给人的印象，似乎中国的法律体系只是一个口号和装饰品，可以选择性适用。政府需要法律时，法律就是百姓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政府觉得法律碍手碍脚时，则可以弃如敝履。即法律是单向的，只用来约束百姓的，而不是用来约束公权力的。如果这样把法律道具化，显然，当事人眼里的法律已无任何神圣性可言，当然也就谈不上对法律的任何敬畏，而只有纯粹出于控制需要的功利地利用法律。

也就不难理解，两位重量级的法律专家会在近日反复强调法律的神圣。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光权近日呼吁：“要真正让官员认同、尊重、信仰法律规范，而不是因为他执法或了解法律而去玩弄法律。”全国人大常委徐显明教授同样呼吁：当通过法律达不到目的时，统治者便可抛弃法律，而改用其他手段，这是应该抛弃的人治观念。善法之治中的法治，法治就不再是手段，而是人民共同的生活方式，是任何人也无法抛弃的生活方法。

法律不是道具，政治家既要用法律治国，政治家更要受法律的约束。对法律神圣的信仰，应该成为官员素养中的第一素养，官员本能中的第一本能。一句话，只有当对法律的信仰能够深入官员的骨髓，能够在官员心中生根，法治才可能在我们国家生根，才可能从根子上杜绝选择性执法，法律才不会在人治过程中起到助纣为虐的反作用。

法律必须神圣，一个重要的因素，还在于它公正而无所偏私地同等保护所有的人，它是所有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挡箭牌，包括罪犯——
即便是罪犯，其基本权利我们的国家法律也是一体保护的。即使追究其刑责，也是依照法律框架进行的;追究的工具、保护的工具，都是已经设定的法律，而不是让相关法律靠边站。一种行为，只要是符合法律的，即便行为人别有用心，也不能找借口处置他。处置任何人都必须依照最严格的法律程序，而不可以无法无天，再怎样貌似正义的理由都不能用废止法律的办法，来进行法外施刑。

当下法律界有一种说法，叫法治倒退。法治是否真的倒退，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今日中国某些官员法治意识的倒退，则是事实。不止是无视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两会”宏旨，而扬言“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其他雷人之语平时也是冲口而出：诸如“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诸如“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诸如“与政府作对就是恶”、“拆迁自焚就是暴力抗法”。这些雷人之语看似偶然，实则展现了某些官员迷信强权而蔑视规则的潜意识。

前途是光明的，但现实也是严峻的。要想把纸面上的法律变成现实中的法治，要想向法治体系顺利转型，当前首要和核心的任务，的确如周光权委员所称，是以法治官，以法治权，让官员时时守住法律的界线。今后的普法重点，必须从百姓转向官员，对官员要以守法、用法当做重要的考核升迁指标。只有这样，才能让法律体系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秩序，才能让整个国家按规则有序地运行，也才会有可续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

（陈有西，律师，法律学者。原文链接：http://chenyouxivip.blog.sohu.com/169249102.html）

7-5 翁文铿：怎样游行才犯法？——香港的游行法律

“香港是法治社会，法官再保守落伍，也是依然会坚持人权和法治的，所以就算警方主观意愿上再想硬，客观上还是得看法庭如何判，只要没有主动使用暴力，法官多会同情示威者的。”

公民抗命不是问题，静坐抗议也不是问题，但要抗命也得先知道法律是如何的才能抗。以下会谈及香港的游行法律。

1. 伪通知制

在香港要举行集会要提前七日事先通知警方，而名义上游行也行通知制，但事实上还要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变相就是牌照制（即要警方批准才能游行）。而且公安条例第17A条写明，不事先通知就是犯法（非法集会Unauthorized assembly），更可以用六七暴动时代遗留下来的严重级数判刑（最高五年），但现实上自97后唯一一次非法集会判刑（05年的长毛案） 的刑罚是罚款HK$500。

05年的长毛案上诉到终审法院，对通知制作出宪法挑战，但终审法院裁定公安条例中的通知制及给予警方限制游行的权力为合宪，所以在可见的将来，不作通知而举行游行是犯法的，但刑罚很不可能会高到要入狱，而且警方在顾虑到以这种过时和荒谬的法例去控告完全和平的游行示威人士，必然会引起社会强烈反弹的情况下，除非没有其他罪名可选，否则很不可能会用非法集会控告。

2. 非法集结（unlawful assembly）

公安条例第18条写明：“凡有3人或多于3人集结在一起，作出扰乱秩序的行为或作出带有威吓性、侮辱性或挑拨性的行为，意图导致或相当可能导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结的人会破坏社会安宁，或害怕他们会藉以上的行为激使其他人破坏社会安宁，他们即属非法集结。”其最高刑罚和非法集会一样。

第18条的重点是破坏社会安宁（Breach of Peace），这词汇因定义含糊，已经被香港法律学者从80年代骂足30年了，因为何谓破坏社会安宁是非常难定义的。而在英国，“破坏社会安宁”的定义80年代已经出现，至90年代已经经常使用，就是“There is a breach of the peace whenever harm is actually done or is likely to be done to a person or in his presence to his property, or a person is in fear of being so harmed through an

assault, an affray, a riot, unlawful assembly or other disturbance”
。而09年陈巧文的司法复核案就清楚地使用了这定义，以后香港的判案多半都用使用这定义的了
。

这定义的意思就是说“破坏社会安宁”必须有：
(a) 对人或对财物的实际伤害或破坏，或有可能造成伤害或破坏，或
(b) 令其他人恐惧会被伤害（对一个正常的人来说）

也就是说，如果符合不了以上定义的话，非法集结（及其他很多公安条例中有“破坏社会安宁”字眼的罪名） 都是告不入的。

最近一宗游行有关的非法集结罪是2010年的区国权案（长毛及其他约六人冲击孙明扬住宅
）
，涉及了冲击警方防线，也只是判了守行为18个月，可见除非涉及蓄意的暴力或威胁（例如黑帮晒马），否则以这罪名判监的机会非常低。

3. 这就是警权！

公安条例第17A条写了很多罪名，主要列明警察有权更改甚至终止任何游行（无论有没有通知），如果不按警方指令，就是犯法。

这种限制是颇不合理的，但首先，由于05年的长毛案中，法庭要求警方在作出限制时要确保这些限制是必须（necessary）及合比例的（proportionate）
，为免被人司法复核，警方也不敢太乱来；第二，会公民抗命的人，早就从通知制的阶段抗命了，根本不会去到游行中警方作出限制时才抗命，因此，第17A条在97年后几乎没有使用。

4. 扰乱秩序

公安条例第17B条：“任何人在为某事情而召开的公众聚集中作出扰乱秩序行为，或煽惑他人作出此种行为，以阻止处理该事情，即属犯罪。”

「扰乱秩序行为」的定义也是非常含糊，但很少用在游行示威上，多数都是用作告拍人裙底一类的行为的，但近日社民连几个青年却有可能会面对这罪名，由于没有往迹可寻，很难估计判刑，但估计也会很轻。

5. 阻街

阻街本来是用来告小贩的，但当警察告无可告又要告示威者时，就会用到它了，毕竟，那有示威不会占用公众地方？

但在2005年的法轮功案中，法庭裁定要令其他人无法合理地使用公众地方才算阻街，因此只要不是蓄意地令其他人无法合理地使用公众地方就不算阻街，而且，法轮功案中，法庭更强调，如果警方的拘捕是不合法的话，被捕人士是有权合理地反抗的，例如案中法轮功学员手绕手不肯下警车及因而和警员有碰撞，也不算阻差办公和袭警的。

6. 阻差办公、普通袭击及袭警

有听过冯炳德的遭遇的人也会知道，普通袭击及袭警是很容易入罪的，因为普通法下，甚至只是令人合理地觉得你会袭击对方，即使没有动手，也算袭击（Assault）的，有“未经对方同意下蓄意和对方有身体接触”，就更加是“殴打”（Battery）了，当然，只碰对方的话，可以入罪，但法庭当然不会处理这么轻微的事了。

而正如上述所说，警方有权更改游行安排，如果反抗，除了第17A条外，还能告阻差办公。

而警方自从05年的长毛案从宪法上挑战了公安条例，虽然本身几乎没有实效（令公安条例要作出字眼上的修订），却令警方担心如果再用这些过时的六七暴动时代法例，将有可能再被人宪法挑战，影响威信，所以事实上是近五六年因长毛案而改变方针，对游行本身从宽处理，对游行人士却用阻差办公、普通袭击及袭警等罪名去告，间接地阻吓示威者罢了，而非警方手软。

结论

在香港，由于公安条例是六七7暴动的产物，之后的三、四次修订都只是小修小补，还要是在社会强烈反响后才作出少许修订，例如1980年的修订是因为周水案、1995年的修订是因为1991年的香港人权法案，也因此，公安条例一直是社运人士要求改革最烈的条例，例如1992-1995年陶君行年代时的学联、2000年在“大声公声浪袭警”案后的学联。不少社运人士都有被这些法例控告的经验，而民主党那种安份得近乎政府同谋的游行方式，就是因为要避开公安条例的结果。

所以，如果要出来游行，又不满意民主党式游行，想做多一点，你就得有被人告的心理准备，当然，刑罚是会比较轻微的。

鹰派曾伟雄上台，警方可能会更加强硬，不过，始终香港是法治社会，法官再保守落伍，也是依然会坚持人权和法治的，所以就算警方主观意愿上再想硬，客观上还是得看法庭如何判，只要没有主动使用暴力，法官多会同情示威者的。

（翁文铿，香港独立媒体作者。原文链接：http://www.inmediahk.net/%E6%80%8E%E6%A8%A3%E9%81%8A%E8%A1%8C%E6%89%8D%E7%8A%AF%E6%B3%95%EF%BC%9F-%E9%A6%99%E6%B8%AF%E7%9A%84%E9%81%8A%E8%A1%8C%E6%B3%95%E5%BE%8B）

【群】

7-6 罗永生：六千港元如何撕裂族群？



“平均派钱为什么不是良方，反是毒药，是因为这种措施只问资格，不问需要。富者六千、贫者六千——
它所涉及的资源错置和浪掷是其一大弊端。六千元解决不了中产面对的问题，六千元却又足以引起低下阶层之
间的相互嫉妒。不过，最坏的还在于，这种“一刀切”的利益再分配，偏离了一个自由主义社会底下，社会收入再分配应是根据一些可以供反思和理性辩论的公义原则。”

政府派钱六千元，掀起香港一阵仇视新移民的恶浪，把香港社会撕裂。

一项表面看起来至少有所谓“抒缓民困”作用的措施，竟然得出比财困还要负面的影响，很多人大惑不解。但其实，这场使很多人对香港社会危机如梦初醒的震动，比起拦路示威，更能显示香港所接近的“临界点”状态。不过，它的征兆，其实早已写在墙上。

2008年环球大股灾，财困问题并非香港独有。但你环顾全世界，能数得出有多少个成熟的经济体系，会采取打开库房向国民派钱的方法来抒解人民经济困境？再往上追溯历史和翻查教科书，又有哪一个当代工业社会的经济学家，哪一本社会福利专业的学术著作，提出过人人平均派钱作为福利改革的手段？

显然，平均向国民派钱的政策，既无学理根据，也缺乏往迹经验，是典型的愚民反智瞎指挥的结果。与其说它是一种福利改革的措施，倒不如说是一种为了掩饰官僚不学无术，缺乏承担，回避面对千疮百孔的经济社会结构性矛盾，以饮鸩止渴的方式要弄的低级民粹主义技俩。

在香港人极目所望，亦只有澳门这几年才有派钱这种做法，香港人亦曾经隔岸讪笑，作为彼岸官僚体系无能低效的象征。只是想不到，当日曾经尚且维护着港人自尊自信的界线，这么就轻轻地被打破。

香港的沉沦，真的可说低处未算低。

平均派钱为甚么不是良方，反是毒药，是因为这种措施只问资格，不问需要。富者六千、贫者六千——它所涉及的资源错置和浪掷是其一大弊端。六千元解决不了中产面对的问题，六千元却又足以引起低下阶层之间的相互嫉妒。不过，最坏的还在于，这种“一刀切”的利益再分配，偏离了一个自由主义社会底下，社会收入再分配应是根据一些可以供反思和理性辩论的公义原则。

所以，问题根本不在于新移民在香港有没有资格去享有六千元。

反对新移民享有六千元政府派钱的理据，在于他们未对香港社会有贡献。可是，如果一个社会有良好的公义教育，就会明白每人有各自的条件和际遇，各各不同的实际需要。社会应合理地为公民们解决他们的关键需要，这些可不是基于要回赠他们作过的贡献。

也就是说，一个公义社会的前提是保障每个人都按基本需要，享有某程度的基本权利，以利于他们在公平起跑线上对社会作出贡献，而不在于成员曾否或能否作出贡献。否则的话，所有天生残障，也应被禁享有任何福利。

其实，一个新移民要融入社会，今时今日所已经享有各类权利，实际上也肯定超出了六千元。如果政府把这突然由几百亿库存拨出的六千元，都一如既往，理性地按需要化为具体的服务或补贴，使真正需要的人受惠，公帑就会用于建设一个人人最终都受惠的公义社会。

可是，当这数额化为现金，事情就变成好像一宗全民共同参与的“分家产”案，赤裸裸地以纯然随意的标准去以争论谁有资格，展现的不是理性、包容，而是人性底下的嫉妒和仇视。于是，所有关于“需要”的论述和公共理性都被取消，富豪家族分产的闹剧，竟隐隐然成为公共政策争议的参照。这样的话，惟一可以流通的语言就是恐惧、敌视和怨恨。族群分裂的根源就在于这种社会政策公义原则和公共性的丧失。

反移民的情绪并非香港独有，所以也不用急于指责这种现象为法西斯主义。可是，在不少西方国家，反移民情绪的确是右翼极端主义的温床。奥地利的自由党、法国勒庞(Le Pen)父女领导的国民阵线，和澳洲一度风头甚劲的汉森夫人(Pauline Hanson)与她领导的单一民族党，都是新型极端右翼和排外主义的政治现象。

它们的出现，是过去三十年西方偏离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的共识，自由主义亦随之而为市场原教旨主义所取代之后的产物。在“小政府、大市场”的教条底下，民怨频生，新右政客乞灵于危机管理。理应放在改革福利体系的资源，用作于根本没有章法和原则可言的危机管理。香港今年预算案的药石乱投，也可视为一种早有先例可援的排外政治的又一案例。

可是，香港的排外主义又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因为香港人政治及文化的内／外构成更为复杂。香港人的内／外又再分上／下。上方的“外”，指欧、美、日的西方世界，倒是心仪艳羡的对象，不在排斥之列。只有下方之“外”，意指大陆、菲律宾和印巴，才是排外情绪的憎恨对象。

早前菲律宾枪杀人质事件，悲愤的过度滥溢，已经夹杂大量排外情绪，不过，这种排外也是对香港地位衰落的悲鸣。当时这种以敌视菲佣为表征的自卑情绪，在香港有否享有所谓次主权的争论中，竟以政治的方式呈现。一件对菲岛无能政府的不满事件，竟也招来香港自治是如斯被矮化的侮辱。再加上过去这几年，香港自治空间的不断收缩，一个两制名存实亡，能够真心以团结香港人为责任的政治人物几成稀有动物。抗拒大陆的意识，也因此发酵日久。过去几十年，香港人能够严格区分大陆政权和大陆人民的能耐也日渐磨蚀。有人打出反中国化，“抵御文化清洗”的懈人口号，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弹。

所谓新移民也者，早晚都是香港人。可是，没有这几年官方及非官方的所谓“优质人口”论调，香港目前这种剑拔弩张的族群关系，不会获得它在论说上的合法性，令那些使人触目惊心的所谓“蝗虫论”振振有辞，绘形绘声。那些所谓“优质人口”与”非优质人口”之间“合理”分布的谬论，如果不及时口诛笔伐，就只会不断为香港埋下种族主义和族群冲突的毒素。而可哀的是，这些论调的鼓吹者，竟然大都是那些热衷于所谓中港融合的利益集团。他们以为，只要高举“融合大趋势”、“爱国主义教育”、“文化回归”这几度符咒，香港人的身份矛盾就会“解决”。

可是，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与全球化一同出现的，正是族群冲突和种族主义的急速复兴。新自由主义思维下由财团主导的中港融合，也同时激化了恶质右倾、排外的本土主义。针对这些现象的治疗良方，并不是目前那套空洞的爱国主义教育或文化回归，因为爱国主义教育召唤人们认同的只是权势、是死的文物、是遥远不着边际的古老文明，是奥运奖牌，是不着地的太空人，是虚浮的荣耀，却不是学习对邻舍的接纳，对他者的开放，对异已的宽容，对痛苦的同情，对苦难的承担。

爱国主义之爱反是淘空了人对社群之爱的正确基础，因为它只教你去爱中国，却没有，甚至禁止你去爱中国人，把这些中国人看成邻舍。

这种优良的情感素质，是公民成熟的标志，是主体性的彰显，是人的自尊自信有没有空间去生长和发展的终极考验。但自尊自信可以建立的前提正是，社会上还尚存羞耻之心。香港回归中国十多年，却为了六千元而弄至群众空前撕裂，一批中国人以种族主义的谰言辱骂另一批中国人，孰令致之？造成此等严重失误的当权者轻忽了事，问责无从，社会所失却的是一种基本的廉耻。

手足相残，同胞如同雠寇........无耻之毒，又岂只一点排外主义？

一样是水，却还要区分井水河水，又那会不生歧视和种族主义？

（罗永生，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原文链接：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0a9a0e8fb23bd6cb）

7-7 梭镖党：谢谢慕洛，祝你好运——长颈人的故事

“文化，政治，尊严，进步和扬弃，演化和异化，利益和道德，生活方式和成长，大千世界的人和看法在慕洛这一个特例上相遇了。我们看到了什么？理解了什么？我们能因此而更宽容吗？能因此而更睿智地对待世界和他人以及自己吗？”

一

泰国西部与缅甸接壤的地带，深受缅甸的影响，盖因历史上长期被缅甸统治，而最近二百多年，即便是在泰国统治下，也有很多克伦族人从边界那边迁来，他们活动的范围大致以山地为限，向东伸展到清迈附近的茵特浓山。英国人统治缅甸时（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缅甸出产的木材运进泰国，顺河而下抵达曼谷地区，因而这里又难免英国殖民文化的影子。

自从缅甸独立起，联邦中央政府和边地民族的和平岁月春宵苦短，只有那么几天，半个多世纪来几乎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战事强度时强时弱。在泰国西部边界的夜丰颂、美洒凉、美索等城镇的对面，缅甸境内，是主要由克伦族栖居的邦。克伦人和缅甸中央政府打了几十年的仗，尤其是80年代以来，中央军的加强进攻已使大量难民逃入泰国。联合国难民署沿着边界设立了九个难民营，说是登记难民有五十万，据信没登记的达到一百万。这是规模相当大的难民庇护系统。难民营多数都藏匿在深密的山林里，河流边，外人很难到达，就算到达也不得随便进入，营内的人也不得自由外出。泰国政府不想接纳这些人合法进入社会。然而，由于克伦族本来在泰境内就有不少，所以非法难民仍大量存在于边境地区，形成了廉价劳力市场。正因为廉价，他们才争取的到一些帮工机会。非法难民的生活非常简陋，往往不受有效管理，也没资格得到食品配给和医疗照顾，他们是联合国难民署方面最担心的健康卫生隐患。

难民营的意义本来是临时性庇护，等候难民的家乡恢复平静，就返回故土，但事实上这些营地已成为固定的大型村落 --
很大，最大的马拉营地的人口数目达到五万，少的也有几千人。本地民族传统样式的竹木房屋密密麻麻，布满了山坡和山坳，从卫星照片看去触目惊心。这些营地的人口，超过了地广人稀的泰西山林地带的一般村镇的人口数。这是诡异的现象，而且违背人类居住环境的合理条件。更诡异的是这么多人不事生产，等在那里空口吃粮，居住密度又这么大，处于危险的亚健康和不健康心理状态。长期喂食这些人是个巨大的负担自不必说，社区管理也是艰巨任务。在营地里，犯罪和性侵问题早就引起了关注，而管理中的腐败是另一个问题，这里还没谈及难民营中的政治活动，因为缅甸诸多政治势力的角斗延伸到了难民营，来自边界那一侧的武力袭击早已不是稀罕事，甚至发生过难民营里栖身的某派别领袖被刺杀的事。

2008年初和2011年初，我两次来到泰西的这条边境地带。美洒凉（Mae Sariang）附近的边界上有两个难民营，它们是我今次前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三年前那次我则是走到了泰西边界最北端的夜丰颂（Mae Hong Son），在那里，我造访了“长颈村”。当时我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国民党残军在泰缅接壤地带的活动、历史和现状，所以对长颈族人主要是猎奇的一看。直到最近在泰国和回来后的日子，认真阅读了一些关于泰缅边境克伦难民的资料，包括长颈人的资料，结合自己的亲历，我才看见了真地心痛的东西，印证了当时隐隐的然而我很清楚记得的直觉。

那天抵达夜丰颂，找定旅馆住下，跟老板要了张本地简图，看见了图上标示的长颈村。在清莱的山地部落博物馆接触到的信息说这一带有长颈族人从缅甸过来。其实更往远说，关于缅甸山林里居住着长颈族，女人脖子上套了很多铜圈，这事是早就影绰有所知的，从没打算过要去探访，因为想象中那个偏僻闭塞就遥不可及。简图上标示的长颈村有三处，两个在夜丰颂城区的西南方，一个在西北方。我盘算要专门用一天访问长颈村，当天的剩下时间就骑上摩托车出去探查路径，跟着指示牌走到了通往长颈村的码头。我躺在河边的竹床上睡了一觉，听着机船扑扑作响，疾奔着运送游客去那村子，我已决定不接受这种半强迫的打包观光项目。坐船成为参观长颈村的一个你必须接受的组成部分，说明旅游业程度已相当之深。走陆路前往似乎也不是不可以，但显然不受旅游业者的鼓励，往前连指路牌都没了。

事后我得知自己做了个正确的选择，许多资料说，这个必须乘坐彩绘长尾机船方能到达的长颈村，就是个旅游纪念品的水边一条街，喧嚷而浮躁，而且，它是由我次日去造访的那个西北方向的长颈村（Nai Soi村）分离出去的。Nai Soi村是泰国境内所有长颈人扩散的源头，他们还被陆续运到了清莱、清迈去展览，被商人用来卖票赚钱。清莱的山地部落博物馆愤怒地称这是“剥削”行为，号召抵制这些展览，但没什么效果。今年一月我在网上搜到清迈附近展览的长颈族女孩的照片，看上去华丽而怪异，让了解背后故事的人难禁一丝酸楚。

其实，反躬自省，我之参观Nai Soi村，和其他人在清莱、清迈参观长颈人并无根本不同。充其量不过是我进了山，而他们连山都懒得进。

第二天骑车出了夜丰颂城区，稍微糊涂了一小段路，然后就有很清楚的路标，牌子上画着长颈女，还有箭头。有这样的路标，说明这是一条得到官方认可的旅游路线。我在泰国还真没遇到过如此清晰简明、一贯始终的景点路标，从二十多公里外就开始设置，出现在沿途所有该拐弯的路口，没留下一丝疑惑，唯有最后三公里土路上不见了指示牌，但已到跟前，土路上也跑不快，错不到哪儿去。

土路尽头有一片空地，一侧是一道警卫森严的大门，里面山林浓翳，旁边另一门楼则是可通行的，依稀望见里面远处的木屋群落。门楼内一座房子，有个女人卖票，每人250泰铢。我向来对在村口、路口拦道收钱的举措深恶痛绝，但是两个多小时后我改变了看法。那道岗哨里就是联合国难民署在泰西边界泰侧设立的九个难民营之一 -- Baan Mai Nai Soi难民营，泰国官方对之的正式叫法是“临时庇护区”，有二万难民；这需买票进入的是Nai Soi的第四区，它是难民营的一个特别区域，里面住着长颈族人。他们的名称在外界嘴里相当混乱，但他们称呼自己克焉人（Karan）。

买票后，走一百多米两侧丛林茂密的土路，就进入了村庄，传统式样的竹木房屋大多苫着草顶。很安静，露面的男人不多，编着筐，衣装和外人无异；女的织布，她们有些人脖子上戴着那个著名的黄铜颈圈。有一半以上人家的门外摆着售货摊，都是旅游工艺品，但没人主动向我兜揽生意，一个都没有。他们沉默而友善，看得出对外人来访习以为常。我对这种环境一向感觉敏锐，我呼吸到了一种隐隐忧伤，一种压抑的空气。这不是快乐自在的村庄。

村子最里头是一片稍开阔的空地，有个医务室，还有所学校，由两列竹棚子组成，一共六七间教室，有一间正在上课，里面十来副桌椅，坐着约十二三岁的几个学生。几个老师过来陪我，一个28岁的志愿者，来自靠近老挝边界的泰国姑娘，文雅娴淑，教泰语的，英语说的很勉强，我问不到多少关于学校、村庄以及这个民族的详细情况。有两个本村出身的老师，男孩子20岁，说自己l996年从缅甸过来的，在难民营读了中学，就当老师了。另一个是戴颈圈的女老师，19岁，她听我说“你是缅甸人”时立即反应，强调自己是泰国Nai Soi的人。

倒是村里两个男人英语不错，跟我谈到民族来源。一个男人说他们祖先来自蒙古，有三个妈妈：黄中国，白傣，棕掸。他们崇拜龙。我和他合了影，显示屏上两个人真的挺像的，都是宽颧骨、连鬓胡子。另一个男人告诉我这些人全部是难民，他自己1992年过来的，前几年搬到了南边的村子，写了本介绍克焉人文化的书，放在妹妹的店里卖。他欢迎我去那村子访问。还说到婚姻，克焉男人可娶外女，但女的不嫁外男，就这三个村的范围挑选；也不是什么绝对的规定，女不外嫁有个最底线的限制就是那脖子。

长颈人是克伦族（Karen）的分支克伦尼（Karenni）的分支，掸族人称呼他们巴东(Padaung)，整个缅甸也都跟着这么叫，但他们不喜欢那名字，自称克焉(Kayan)。泰西边界的9个难民营，有两个是专为克伦尼人设置的，但其中戴颈圈的克焉人只是少数。有的时候，克伦尼和克伦被外界相提并论，听起来好像是两个民族，虽则理论上说克伦尼人是克伦族的一支。外人还往往简单地把克焉人称作长颈克伦人（Long Neck Karen）。这些民族的称谓和归属是外人很难弄清的事。就战争难民这仍在继续进行中的政治事件和戴黄铜颈圈这文化传统而言，克焉人的族属倒也不是重点。我关注到的重点，是眼下战争与传统习俗这两件事在克焉人身上，在泰国领土西北部这个山林角落，如此强力地以一种病态连结了起来。

二

写这段文字时我感到压抑之痛，再浏览当时拍的照片，女人们颜色艳丽的服装，还有活泼的孩子，她们的熠熠生辉的颈圈，掩盖着一般游人在呆望、拍照、攀谈之外所不知道的故事。她们为何戴这种颈圈？会持续戴下去吗？她们快乐吗？有什么盼望？外界怎么对待她们？这些人何以能获准居住在严格看管的难民营以外？这些我都所知甚少。今年再次泰缅边界之行看到了其他难民营的情形，提供了理解的背景，对这个泰国境内原本没有的长颈部族和他们的生存状态，才有了可以拼零凑整的了解。鉴于整个全景画的信息集合相当庞大，容我先从那天参观了Nai Soi村后的笔记开始，其中有些今天看是明显错讹的内容删掉了。

****

夜丰颂有三个长颈村，都距泰缅边界不远，其实原先只一村，南边两个的村民是北边这个村迁出的，迁移原因，我今下午问Nai Soi长颈克伦村卖票的女人，她说是此村人口太多，生活资源支持问题。但我想，可能也不排除旅游业的因素。既然有人为旅游业把长颈克伦人弄到清莱省去，在本地多弄出两个村子就不足为怪。新地点要交通便利些，环境有趣些，方便开展相关的生意，南边两个村在这几方面都优于Nai Soi，两个都距夜丰颂仅十多公里，一个可在河上乘船到达，一个旁边可骑大象，而Nai Soi的不利除了路远，距夜丰颂二十多公里，最大因素可能是它紧贴一个严格管控的边界难民营。

卖票女人告诉我难民营里面有三万来自缅甸的难民，数目之大吓我一跳。她说泰缅边界有很多难民营，这个算是大的。难民营靠国际社会支援过活，其中各族的人都有，如克伦族、掸族，多是九十年代缅境打仗逃过来的。我问现在还有来的吗，说还有。难民营入口和长颈克伦村的入口紧邻，山坡上有道分隔的竹篱。这些长颈人也是九十年代来的。我问了至少三个人为何他们可以离开难民营过自由生活。没人能答复我，不知是因超出了他们平日接触访客时使用英语涉及的话题范围之外他们就听不懂了呢，还是有他们不愿说的因素。其实可能还有另一种情况，被允许离开难民营的或许不只长颈人，但是别的那些人不显眼罢了。

我这些天对泰北的长颈人的来源追溯是个一步步的过程，从清莱的山地部落博物馆开始。把这些难民用来做旅游业，想着真是件残酷的事。PDA（泰国人口和社区发展协会）的清莱山地部落博物馆的态度是泰境内本没有长颈克伦人这一支，他们是被人蓄意搬过来的。清莱一家旅行社的职员Krongthong K向我证实，清莱的长颈克伦人是旅游业者从夜丰颂搬来的。出村后我问卖票女人，她说那两个村的人都由此迁出的。那么，清莱的长颈人终归都出自Nai Soi，他们进入泰国顶多也就十几年。

长颈人在这里何以为生呢？他们种地吗？泰政府发钱吗？卖票女人说他们不种地，有的男人外出做工挣钱，女人在家卖旅游纪念品。那么他们吃什么？卖票女人说家里养鸡，上山挖竹笋。我问每天这村来多少游客，二百人？她惊讶：二百？二十到五十人。我说那能卖多少纪念品？她说总是点收入，他们这么过日子也基本上不怎么需要现钱。我觉得意外，这些人居然自己不生产粮食，还保持着采集的传统。我再三追问他们不吃米面吗，哪里来呢？答买，游客付的每人250铢进村费就是用于此类补贴开销。听到这，我为自己在村里一分钱东西没买而惭愧。那些长颈女人们对照相的要求都十分配合，一点不拒绝，也不要钱。特别是进村后第一个摊子的十七岁女孩Mu Loe，被我摆布了好一阵，一丝怨言和要求都没有。我现在想回去后给她寄两张大相片来。忽然明白这根本不是新鲜主意，有的女人的摊子上，包括Mu Loe的，挂着本人的大照片，那应该都是游客送来的。

他们都不喜欢缅甸，说政府迫害。一个被迫逃亡的民族的成员讲的未必在全景意义上真实，且放下人道灾难不说，我看到了民族变迁。民族发生演变时通常不是整体转化成另一个，而是局部演化，生出新的部族，这往往不是单行道，也有别人的某部分融进来。泰缅边界现正发生着古已有之的民族渗透、交汇和演变，这是一例。

长颈人在缅甸也是居住在偏远地区，而这些难民入泰后，每天有外人参观，迟早女孩子会不喜欢戴这东西，她们发现了别种的美，又方便又健康。村里八九岁到十几岁的女孩戴铜圈的不少，坐在竹屋里读书，跟别处乡村学校一样，我不信这些女子还让她们的下一代戴这东西。变化，会多快发生呢？

****

一个外人自然而然、顺理成章要提出的问题是克焉女人为何戴黄铜颈圈。这问题和问怒江的独龙族女人为何要文面，有些非洲部落的人为何要割开下嘴唇嵌入一个圆盘，古代中国女人为何要裹脚一样，似乎有答案，而且不止一个答案，但却没哪个答案是唯一权威的。这黄铜颈圈是一个连续螺旋的线圈，传统上，女孩子五六岁就开始戴，随着人长大，颈圈也换成大的，最重的据说可达20公斤。所以，她们的脖子其实不比常人的长，而是肩骨被压低了，这早已被爱克斯光检测结果所证实。究竟她们为何愿意承担如此终生重负呢？黄铜颈圈的功能是什么呢？维基百科说，有人说是为了美；有人说是为了模仿龙的样子，因为民族传说里，克伦人是母龙和男人（或男性天神）交合所生；还有的说是为了防范山林猛兽噬咬喉咙。克焉人自己对这些解说都一定程度上认可，但她们还说，是为了文化认同，亦即作为一种标识。作为标识这一说听来更多的是果而不是因，当然因果关系形成后是可以倒置的，比如鸡和蛋便是一例。所以为何戴颈圈还是没有答案。

克焉女人自己没工夫老研究自己戴颈圈的理由，但外界认为她们身体畸形，认定这是不健康的陋习。其实这可能也是个类似“子非鱼”的困境辩题。有资料显示，克焉人没觉得这是陋习，

某些克焉部族头面人物这么告诉媒体，女人们则说对这重负已习惯了。然而这些辩词都不能消除外界的质疑和实际上的蔑视，更重要的一点是都不能阻挡旧习俗消失的趋势。我三年前的笔记里提出的问题：变化会多快发生呢？实际上变化早已在发生，缅甸境内克焉人聚居地区戴颈圈的年轻女人越来越少，越是偏僻地方，旧习俗保持的就越多些。随着和外界交往增加，被迫或者主动地，她们也意识到了颈圈的弊端，一是不便于进行各种劳作，二是太引人注目，造成困扰，第三就是妨碍她们进入主流社会，比如谋求教育和就业，从而错过了拓展机遇。缅甸政府公开鼓励克焉人放弃这一习俗。倒是在泰国，在战争难民这个大背景下，在夜丰颂的几个边界村子，克焉女人戴颈圈的现象呈现一个逆向的复兴态势，并且随着旅游业的如获至宝之喜，她们和黄灿灿的颈圈一起现身内地，成了曝光率更高的观赏目标。这就是我上面说的，战争难民这事，和黄铜颈圈这传统习俗，病态地连结起来，在泰国这所谓自由、开放、微笑的美好国度。滑稽的是在一般所说的邪恶野蛮的缅甸境内，这旧习俗本来正走向衰微。

每年大约有4000游客到访夜丰颂的三个长颈村。他们不仅带来了进村费，还有食宿行和购物等开销。泰国官方，特别是夜丰颂地方当局，已把长颈人当做旅游业的卖点。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缅甸境内一支与中央政府合作的克伦民族武装势力竟然邀请这些克焉人回家去办这个生意。任何此类企图都使泰当局紧张，决心要看紧了这块资源。

如下这样的控诉很容易做：乘人之危，只因她们有某种罕见习俗，此乃不折不扣的“人类动物园”，是文化剥削和人格凌辱。然而另一方面，看看Nai Soi村里女人们身上的服饰，那么光鲜而且齐整，就算是旅游工作服，已说明了她们有一定的收入。纽约时报一篇文章说，游客付的250铢门票款一半交给泰国内政部，难民事务归它管，另一半交给缅甸境内的一个克伦族反政府组织。（我对这后一半去向有点怀疑，等于是泰官方公开资助缅甸的反政府势力，有违外交准则，因为两国并非敌对国。）村里戴颈圈的女性每月得到补贴，未成年人每月500铢，成年人1500铢。仅仅这一项收入，已是整个泰缅边界众多难民中令人羡慕的稳定现金收入。一个偷偷打工的难民在饭馆里当跑堂一个月能挣1500-3000铢，他得天天工作，每天忙碌10小时，这么看，村里戴黄铜颈圈的女人的收入似乎真的是比较容易。克焉人说，他们在旅游村的收入好过在缅甸的家乡。

看了上述数据，我才明白为何2008年初我在Nai Soi村里遇见那么多十来岁的女孩子戴颈圈，似乎有悖于时代潮流，但至少一部分缘由是她们在为家分忧。不过，事情就在那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对泰国官方利用她们的行径，长颈村的克焉女人，以慕洛为代表，起来反抗了。

三

2008年1月长颈村口那个卖票的人告诉我Baan Mai Nai Soi难民营里有三万人，这个数字有点含混。最近我查了TBBC发布的正式数字，发现这座难民营

的人口在2006年后的几年中基本维持在二万上下，浮动量不超过几百人，现在则降到了1.4万多人。TBBC（Thailand Burma Border Consortium）是个由来自10个国家的12个非政府组织联合组成的机构，1985年成立，为泰缅边界的难民提供食品、居屋、医疗等援助。难民营的管控是泰国主权内的事，援助这一摊则主要由TBBC承担。TBBC的网站上，有自2006年下半年以来的泰缅边界各难民营人口逐月统计数字。2011年1月底的统计数字显示，Baan Mai Nai Soi难民营有14429人，十个难民营共有138597人。

不过，TBBC发布的数字和实际难民数是有出处的，因为它的数字是登记在册的难民，而没登记在册的为数不少，可能多达营内实际人口的30%。只有登记在册的人方可领取食品配给和通行证，那些没登记的，过着更偷偷摸摸的苟且日子，随时可被警卫揪住刁难一通。泰国政府在一个正式立场上把难民视为非法入境者，所以没有行动自由，理论上需逐一甄别审理，看他们是否有可接受的理由留在泰国境内，然而实际上不过是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把这些人打发掉。不愿接纳这些难民进入泰国社会，顾虑自有其道理：倘若轻易接受这么多难民，就会有更多人越境而来，对泰国经济和社会的压力太大了，何况，难民中还裹杂着缅甸各派政治势力的人员，情况更复杂了。本文至此只提到了泰缅边境泰侧的难民营，实际上在缅甸一侧也有九个难民营，人数比泰国这边的少，2011年1月底统计共有19914人。这态势在那儿摆着，泰政府的立场就完全可理解了。苦了的是难民，他们被战争驱赶而流离失所，守候着和平来临的希望，要守到哪年哪月就天晓得了。

一点题外话：细心的读者可能注意到了，我前面说过泰西边界有九个难民营，为何这一节又说十个？是这样，泰西九个营地的难民主要是克伦族人（包括克伦尼人，而克伦尼人中又包括克焉人），亦有少量的其他民族；此外还有一个小营地，第十个，位于夜丰颂的东北方，和缅甸的掸邦相邻，是专为掸族难民设置的，只有六百多人，不构成关注重点。缅甸的掸族和克伦族人口差不多，是次于缅族的第二和第三大民族，他们都和联邦中央政府缠斗了几十年了。缅甸其他边地民族也与中央政府长期作对，比如钦族，在与印度接壤的边境地带也有难民营，超出本文话题太远，按下不表。

既然难民受着严格管控，那长颈村的人算是难民吗？他们为何住在岗哨森严的难民营外？一个你马上想到的解释是泰官方为了招徕游客，特意把克焉人放出来。有一定道理，但不是那么简单。事实是1990年代初期这一带有若干个难民营，是在较为松散、自然的状态下形成的，那时整条泰缅边境的难民营数目多于现在，后来做了整顿归并，今天的Baan Mai Nai Soi难民营由三个主要营地整合而成，至今它里面还划分三个区。有些散居的难民没进入归并后的营地，留在了外面，这就是Nai Soi长颈村的由来，泰官方对他们有意无意地睁眼闭眼，虽然没派岗哨管制他们，但难民所受的种种限制多数也适用于他们，比如不准种地，不准随便乱跑，而且长颈村口的门楼上还是写着“第四区”。这个模糊状态导致了纠纷，随后说到。

难民们在泰国一待就是十几、二十年，某个角度上可以说生活安定，但没有自由，没有前景。营地里的十几岁孩子大多都出生在此，从没生活在正常社会环境中，他们的技能和眼界都严重欠缺，心理的不健康、对世界认知的扭曲就没法细说了。每次缅甸境内开火就有新的难民跑过来，稍微平息又有人跑回去，加上界河对面的武装势力动不动就威胁要开炮惩罚难民营里躲藏的敌人，泰皇的臣子们头痛可也没辙。这批人终归要有个出路，国际社会越来越看清了这一点。2005-2006年，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接收泰缅边境难民，所有登记在册的难民都可提出移居的申请，经由泰官方、难民署和目的国审查。迄今已有十多个国家参与这项行动，若干批次的难民已移居到了北美、欧洲和大洋洲。

移居第三国成了难民头顶阴云透射出的新天光，也产生了新问题。首先，移居计划启动伊始，愿意和敢于尝试这条新路的人，多数是和外界接触较多、受过较好教育的人，他们在营地里参与教育、医疗、翻译或分发配给工作，是协助难民营管理的骨干分子，他们走了，留下真空，营地管理陷入窘境，以至于当局要赶紧在难民中寻找和培养替代者。另一个是长颈人的移居问题，一时间成了争吵焦点，起因是泰国当局拒绝承认他们的难民资格，因而不批准他们移居第三国。争吵在2007-2008年，也碰巧就是我到访那前后，达到一个热度，联合国难民署驻泰官员公开批评泰政府把克焉人用于旅游业的做法，呼吁人们不要去参观长颈村。泰政府声辩说克焉人之所以不能算难民，因为他们是山地部族，那意思是说山地部族的习性本来就在山区迁来徙去，未必是逃避战火而跑来的。有的官员表示只有逃离枪战现场的才算战争难民。真的过分了。

一个名叫慕洛、绰号Zember的克焉女子率先摘下了颈圈以示抗议，并且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发表了文章“Zember的故事”。她名传天下。

四

Nai Soi长颈村的慕洛和她的家人于2005年8月一起申请了迁居第三国，次年她们获得批准，做了体检，被告知很快将启程赴新西兰。但是泰国当局拒绝发给她们出境许可，并说这些人本来就不具有申请迁居的资格。夜丰颂省长还说，新西兰接受一组克焉家庭移居，还要给她们专门建造村子，这是争夺泰国旅游资源。事情变的沸沸扬扬。旅游村这些克焉人多年和外国人接触，已经拓宽了眼界，她们开始抗议。慕洛愤而摘除了自己身上的铜圈，拒绝再让自己的文化被人利用成为自己的桎梏，她要追求自由。外国记者接踵而至，许多主流媒体做了报道，包括BBC，也包括世界顶级女性杂志《嘉人》（Marie Claire），慕洛的照片出现在全世界面前，戴着颈圈和不戴颈圈的，那些戴颈圈的片子是她应记者之请，特意为拍摄而重新戴上的。

下面是慕洛2008年2月写给媒体的一篇文章。是哪家媒体我没能查清楚，因为国内网络查找国外资料实在是很费劲，翻墙梯子也不牢靠，追踪一条资讯要反复攀爬，仍往往未果。但我查到了《嘉人》杂志国际新闻栏目发表关于慕洛的报道"请放我自由"是2008年4月下旬。慕洛的绰号Zember比"慕洛"更广为人知。她对绰号的由来做了解释。下面是"Zember的故事"全文翻译，万一有不确之处我负全责。全文共三部分，后面两部分各有小标题。

****

Zember的故事

我的名字叫Mu Lo，我的父母（Mu Pau 和La Peh）给我那个名字(注：Zember)是因为它在我们克焉语言里是"黑"的意思，他们觉得我是个很黑的婴孩。但是我的朋友叫我Zember是因为我在十二月出生。我1985年出生于缅甸的克伦尼（克耶）邦的Demawso，但现在我住在泰国北部的Baan Mai Nai Soi。

很多记者到我父母的房子来找我。我害怕和他们说话，但是我想让人们知道我的故事。

我1989年和我的一家来到泰国。我们一起有七个克焉家庭，因为我们国家的战争，不得不逃离。那时我很小，不记得很多事，但我父母告诉了我，我们总是不得不逃离我们的村子，躲避缅甸士兵。我父亲是村子的头人，所以缅甸军队总是责备他，还要他选人为他们当背夫。我们没有足够的食物，因为士兵们抓人做背夫，就没有人干农活了。当缅甸士兵到我们村子来，他们长时间待在我们家，我母亲不得不跑东跑西为他们找吃的，所以我们就逃了。

首先我们来到边界上的Naw Pa Ah，停留了差不多两年半。那里有很多克伦尼难民，不仅仅是克焉人，但是那里不安全。因为缅甸和克伦尼军队之间的战斗，我们不得不老是藏匿在丛林里，所以我们都搬到了另一个地方。然后，一个泰国商人来了，他带我们来到Nai Soi，就是我们现在的地方。他的名字叫Tu Loh，他展览我们，向游客收钱，但现在他已不见了。我们已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了。现在是另一些泰国人收钱。后来，泰国当局告诉所有曾经在Naw Pa Aw 和我们待在一起的难民都要搬进新的难民营，可是他们没要求我们搬，所以我们就留在了营地外面。

所以现在我们仍然住在泰国的夜丰颂省。营地里有大约2万3千克伦尼难民。营地是封闭的，大多数人不得进出，但我们的村子就坐落在营地检查哨以外。泰国当局让我们待在那里，以便游客来瞧我们，因为克焉女人里有些戴颈圈。我以前也戴。

我们村子里有大约50家（大约250-300人）。我们的生活很简单。我们没有电，没有合适的卫生设施，也没有电话。我们的房子用

木头和树叶构成，很容易破损。我们不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没钱，而且我们是难民，所以不能拥有自己的土地也没有工作。还有，游客认为我们是粗鄙的人。导游说他们不想看见好的道路，或清洁的村庄，或任何现代东西，所以我们不得不这样居住以取悦游客。

村里的女人只能经营售货摊和编织围巾出卖。男人可以为我们社区做些木工活，但他们不获准工作。我父亲收集空啤酒罐换一些钱。男人们觉得羞耻，因为他们不得不靠女人挣的钱过活，所以许多男人沉醉在米酒里，因为他们没事可做。农活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土地，但我们的文化就是农耕。有的人为本地泰国人做些临时的农活或建筑帮工，一天大约挣40铢。他们能那么做是因为给难民的劳动报酬低于给泰国人的。

我织一条围巾需要一天，这是很辛苦的工作，因为它令我的肩膀和背疼痛。要是我卖出一条围巾，我能得30或40铢，但是一个月内我只卖的出大约两条围巾。在闷热的雨季，游客来的不多，女人们都织围巾，但现在因为我已摘下了颈圈，没人会买我家商店的东西。戴颈圈的女人每月从控制村子的泰国人那里得到1500铢，但要是没有游客，有时候他们就不给钱。

现在我在主营地里面当老师。我教九年级的普通历史课，这很困难，因为历史书是英文的，有的字我不认得，而且我没受过干这个工作的任何培训。大多数克焉女人都很少受教育。她们不得不早早就停学，以便当游客来访时她们能在村里。但我完成了中学，然后我又在营地里上了后10年级学校。（注：难民营里的普通学校都不超过9年级，"后10年级学校"是为那些准备在营地里工作的人开设的。）这是唯一的较为高等的学校，我的朋友和我是第一批戴着颈圈的克焉女性读到这个层级的。我去年毕业了。我的父母很为我骄傲。

在难民营里我们有很多教育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老师和书本。外国老师不可以在营地里任教，我们的克伦尼老师则不够格。他们自己受的教育都很少；他们只是尽力而为。我们也不能用互联网学习，因为我们没有电话。我想学的多些，但是难民没有进一步的受教育机会。

还有，如果我们病了，我们得付医院钱，因为非政府组织不管住在难民村里的克焉人。他们只帮助住在营地里面的人，但泰国政府不给难民支付30铢的治疗费。这是难事，因为我们能付给医院的钱很少，而费用很高昂。

我为什么要移居

我的村子里有些人，尤其是年长的人，对他们在泰国的生活挺满足的。他们觉得比在缅甸要安全，而且他们乐意在一个地方过日子，不想要别的什么机会。我要去新西兰的理由是因为我听说那里的女人非常自由，她们可以做任何职业。我要有机会学习更多的东西，改变我的生活。我已能说英语，所以我想对于我在新西兰学习将是容易的。

我感觉我是属于那些把游客带来的人的。当我告诉我的外国朋友我只是想做个正常人，想在办公室里上班，他们惊讶了。但是我受够了为游客而微笑。他们不以为我和他们是一样的。他们说些我们的坏话，他们不知道我听的懂，他们嘲笑我们的文化，总是问同样的问题。这非常无聊。要是我有孩子，我不要我的孩子这么生活。

我在泰国不被允许自由活动。他们不会给我们泰国国籍，不接纳我们融入。我只能待在难民村里，或者是白天到夜丰颂去买东西。大多数我的族人甚至不能去夜丰颂，但是我可以，因为我带着颈圈，所以警察不拦我。

在我的村里，我们遇到很多游客，我和他们谈及世界的其他部分，我听说新西兰很美。新西兰是个大国，但并不很拥挤。我在这里的世界非常小，因为我们不被准许去任何地方。来自全世界的人们来看我们，我也想看他们的国家。

所以，当我们听说联合国难民署有个移居计划而且我们可以申请去第三国，我们中一些人就非常兴奋。我的邻居，我的叔叔，我姐姐和姐夫申请了，他们都被接受去芬兰和新西兰。我决定跟我姐姐走，因为她和她丈夫不会说英语，我知道我能帮助他们，而且联合国难民署、新西兰政府也同意。

我们在泰国就像关着的囚徒

我们开始准备离开。我们2005年8月登记了，2005年11月面谈，2006年初听到消息我们将要去新西兰。6月份我们做了体检，被告知很快就将出发，也许就在7月份。我们的已经在新西兰的朋友打来了电话，说他们听到了我们要来，房子也为我们准备好了，但是我们等啊等啊等啊，却没有人来叫我们。

我们申请移居的时候，我们所居住的第19区是Baan Mai Nai Soi一号主难民营的一部分。我们被选中迁居第三国以后，当局说这个第19区不再是营地的一部分了（他们正式做此更动是在2007年初，但我们理应是2006年离开）。省长办公室开始声辩我们本来就没权利申请迁居。我的姐夫说了很多次：“要是我们不可以走，那为什么他们让我们登记。为什么他们写信告诉我们可以走，为什么他们告诉我们做好走的准备，为什么他们给我们做体检？他们应该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去。他们什么都没说，他们说等着吧，你们就快走了，然后没人来告诉我们任何事。这就是为何我们都抓狂了。我们是人，不是你们不与之说话的动物。”

所以我摘下了我的铜圈。我热爱我的文化，但是我们的传统却使我成了个囚徒。首先，我摘下了沉重的肩环，然后，几星期后我把我的颈环弄的短了些，然后我把它们全部摘掉了 -- 我的颈环和腿环。腿环使我的腿很疼。我姐姐帮我摘掉它们。当我第一次摘掉它们我的感觉很奇

怪。我以为我会感觉轻松，但我感觉的是沉重。我的外甥女12岁，也摘掉了她的环，我姐姐也将要摘掉她的。扔掉了我们的文化我们觉得遗憾，但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处境，被迫这么做的。

可现在我们村里的人和泰国人还是盯着我看，并且窃窃议论着我，因为我摘掉了铜环。他们说我不漂亮了，我没有用处。他们说我的坏话。所以我现在住到难民营里面了，远离所有游客。他们也说我姐夫的坏话，责怪他，因为他们说他令得泰国人生了克焉人的气。难民营当局先是说我们愿意的话可以搬到营地里面住，然后他们说我们不可以。然后他们说我们必须搬到靠近缅甸边界的Huay Pu Keng村（注：另一个长颈旅游村）去，但我们害怕去那里。然后他们说我们可以待在我们所在之处。我们非常困惑，因为省长办公室向我们指东，而市长办公室向我们指西，而警卫部队则向我们指南，所以我们总是对我们的处境迷惘不解，而联合国难民署的人不来给我们做任何解释。但是，最后，我们全都搬进了难民营。

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真的是难民。我们是战争受害者，我们有联合国难民署发的难民注册文件，而且泰国当局给了我们Baan Mai Nai Soi难民营的身份，就是说他们接受我们为难民。因此，为何我们被区别对待，不同于其他难民？这里的克焉人中只有很少数的想要离开。为什么他们不能放我们走呢？他们仍然有其他的长颈女人去吸引游客到夜丰颂来。我们并非要到另一个国家去开办旅游村，我们要逃离那种生活。村子并不会因为我而关闭。超过2万难民已经从其他难民营离开了。省长说他阻留我们是因为我们在此快乐。可能有些人快乐，他们想留在泰国，但我家和我想走，所以为什么他们强迫我们留在这里？

现在我不管去哪个国家，我只是要离开泰国。我太生气了，我不能再在这里生活。

一切中最首要的，我要自由。

Zember
2008年2月

****

这事件毫无疑问有西方媒体参与其中的影子，然而泰国政府，尤其是夜丰颂地方当局，把克焉人视作旅游资源，也铁证无疑。一时间，“人类动物园”这个词语到处流传发酵，指控和抗议邮件来自全球，声称要揭露泰国的隐藏的秘密。泰当局不堪压力，不久就批准了慕洛和家人出境。2008年8月28日，她们前往新西兰，开始全新的生活，现居住在新西兰的Nelson。慕洛入学读书，她还要担任妈妈、姐姐和姐夫的翻译，有时侯觉得分身乏术。这个难民移居计划的目的国都把接收的难民分散开，避免他们扎大堆，是为了双方较好地互相融合，所以慕洛一家日常主要靠自己和外界打交道，比如打电话跟互联网公司商量维修事宜之类，都是锻炼。

慕洛曾对外国记者说，她看见来访的外国背包客中那些女孩充满活力而性感，她们眼睛闪亮，她也要当那样的人。她成功上路了，去实现她的自由理想，留下的长颈村女人仍日复一日过着已过了二十年的展览生活。并且，在清莱和清迈，专为展览长颈女人而造的村子愈发多了。我看见网上的照片，清迈的克焉女孩打扮艳丽，化妆时髦，眼睛里也闪着光亮，至少比边界上的长颈村的女孩多份神采。有报道说她们也学会了怎么躲避太过多余的关注，她们不上班时外出用围巾遮挡住脖子。

“人类动物园”这个词语的出现，一个好处是使得参观长颈村的人多了份出自愧疚的自觉，知道尊重别人的尊严，尊重别人的传统，知道世界上人的境遇有很大差别，同情和感恩是应有的品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如是说，应该说相当中肯。然而，这是就参观者方面而言的。要是论及克焉文化传统的保护延续，这个习俗是否该淘汰，则是另一个话题了。慕洛的胜利并非文化进步角度上的胜利，而更多是“政治上正确”的胜利。就在她引发的争议甚嚣尘上时，维护旧习俗的声音也并不弱。维护的人说，克焉人自己没觉得这习俗不好，而且，在泰国，现在克焉人是仅次于苗族人的第二富裕的山地部族。（苗族人善于经营民俗旅游生意是有名的。）这个说法，当然，也只是一部分人的说法，或许是出自旅游业相关利益者之口。然而慕洛的妈妈至今在新西兰居住仍然戴着颈圈，证明这个传统的维系和标识作用不能抹煞。克焉女人戴颈圈并非是乡规民约的强迫，而是自愿。（当然，在旅游村既然戴颈圈者可以每月领到补贴，事情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普通的克焉人家，女孩子要戴上黄铜颈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慕洛说自己小时候是觉得美才要求父母给自己戴颈圈的。她曾经到曼谷作为形象宣传人参加过旅游博览会，可是终于有一天，她抛弃了自己的美的文化，为了摆脱因这文化而遭受的囚禁。

文化，政治，尊严，进步和扬弃，演化和异化，利益和道德，生活方式和成长，大千世界的人和看法在慕洛这一个特例上相遇了。我们看到了什么？理解了什么？我们能因此而更宽容吗？能因此而更睿智地对待世界和他人以及自己吗？

谢谢慕洛，祝你好运！

（梭镖党，1510部落作者。原文地址：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article.php?id=23692570891a3185）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Co-China论坛开始于2009年8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目前已举办十七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卢思骋、闾丘露薇、毛向辉、潘毅、冉云飞、宋以朗、许宝强、叶荫聪、张铁志、周保松、朱大可、朱凯迪等。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请发一封标题为“订阅周刊”正文留空的电邮至：co.china.online.email@gmail.com，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

论坛网址：http://wwmy1510.cn/author.php?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論壇（http://t.sina.com.cn/1729620664）

轮值编辑：方可成、舒欣
版面设计：豆弟
技术支持：毛向辉
出品人：杜婷